

李振纲

主编

厚黑学

影响中国文化的

20

大奇才怪杰

愤世嫉俗

胆识

幽默

鄙弃礼法

才情

孤愤
狂傲
野趣

QICAIQUANJIE

河北大学出版社

扬州八怪
竹林七贤

K825.4

58

影响中国文化的

20大奇才怪杰

李振纲 主编

河北大学出版社

(冀)新登字 007 号

封面设计：慈向群
责任编辑：傅德元
任文京

影响中国文化的
20 大奇才怪杰
李振纲 主编

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保定市合作路 1 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6.25 字数 430 千字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4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5,001—10,000 册 定价:12.00 元

ISBN 7-81028-127-5/I·18

序 言

——悲剧人物的人生曲线： 才、情、志、趣、命

○李振纲

YINGXIANG ZHONGGUOWENHUA DE ERSHI DAQICAIGUAIJIE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成千上万历史人物，他们中有德高业伟的圣贤豪杰，有可歌可泣的悲壮英杰，还有为封建正统观念所不容的奇才怪杰。他们或怀才不遇、孤傲不群、超旷脱俗；或身怀绝艺、风骨凌厉、粪土王侯；或遁迹山林、高歌狂饮、发泄胸中的郁结；或放浪形骸、漫画人生、嬉笑人间的不平。他们的人格、才情、志趣虽为封建正统观念所不容，然而，用历史的眼光看，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着

独有的地位。

圣贤豪杰、悲壮英杰，古今已有不少正传、别传、野史、传奇，记载他们的丰功伟业，而于奇才怪杰却不见有一部专门研究、描述他们的才、情、志、趣、命的书。为弥补这一缺憾，我们结集同仁、携手同心编写了《影响中国文化的 20 大奇才怪杰》一书。

这是一部面对封建正统文化的反叛集。

这是一部古今文化名人悲剧性格与悲剧命运的历史性记录册。

(一)

超常谓之奇，少见谓之怪。本书所谓“奇才怪杰”是指中国文化史上才华超奇、个性高狂、情志雅远、言行乖戾的高人名士。他们在中国文化史上实不多见，故谓之“奇才怪杰”，他们的才情志趣往往为传统所不容，为正统所摧残，为世俗庸见所讥屑，故又可叫做“异端”^①。用“奇”、“怪”的尺子去选取人物素材时，我们又做了进一步的限定、筛选：一、一般人都可能造作的奇（实则不奇），庸常人皆可模仿的怪（为怪而怪），不是本书所说的奇怪。对这种奇情乖趣的人，我们未加选入；二、只奇不怪，或只怪不奇，我们也原则上加以排除。前者如梁任公（启超），11岁为秀才，16岁中举人，堪称近代文化史上的奇才，但他奇而不怪；后者如野史上那许许多多的怪人怪士，他们之所怪，只可作乡曲市井的笑料，毫无文化的价值。于此均不收入。

根据上述所界定的“奇怪”标准。我们自然而然地把人物选择的视线聚焦在下列诸公身上：

^① “异端”一词，本指西洋文化史上与罗马教廷所维持的正统教派所不同的异教及其新教徒。这里泛指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反传统性、非正统性、非世俗性的思想性格的士人。

外寒内炽、愤世疾俗的古代哲人——庄周。如果我们把儒家“道统”当作中国文化传统的主干、正统观念的核心（的确如此！），并依此为“正道”，那么庄子便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异端”之祖。他视千金如粪土、弃相位若弊履的傲骨，宁作泥鳅在污水中戏游而“不为有国者所羁”的洒脱，妻子去世鼓盆而歌、妙解生死、漫画人生的旷达与幽默以及“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狂吼，无不是对儒家伦理的嘲笑和对现实中“礼法”所维系的尊卑等级制的否定。难怪古今失意政客、落魄文人以及为封建礼法所拘挛的“异士”都喜读汪洋恣肆的庄文。庄文固然令人麻醉，但它更能使人忘我，使人天真，使人少一片伪饰，添一缕野趣和真诚！

西汉，统治者为了巩固中央集权制的“汉家”天下，继汉初“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黄老之术之后，定儒家学说于一尊，与此同时，儒学又与阴阳、五行、谶纬神学相结合，开儒学经学化、神学化之端：“三纲”由是立，两千年思想禁锢自此始。西汉少名士而多经师，史迁因直言而遭宫刑，贾谊有奇才孤愤早死。神权、皇权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出身细族孤门的一介士人王充应运而生。王充生活恬淡，为人清重，“贫无一亩庇身，志佚于王公；贱无斗石之秩，意若食万钟。”^①他不愧为汉代“疾虚妄”的志士。面对经学神学的权威，他以衡论是非，不避上圣的精神，讥俗、辩伪、问孔、刺孟、非韩，使汉代神学迷雾与崇圣之风一举而廓清之。有识者云：“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章太炎）。

魏晋以降，华族裂为南北。门阀士族，竞奔天下：魏、蜀、吴争雄于前，曹氏、司马氏两党砍杀于后。温情敦厚的儒家伦理被剧烈的门阀混战撕得粉碎。思想界一时出现真空，魏晋名士清议清淡

^① 《论衡·自纪篇》。

之风趁虚而起。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①是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风流人物：“越名教而任自然”^②，“非汤武而薄周孔”，^③嵇康的名言代表了他们蔑视礼法、嘲弄名教、直性而行、狂放任诞的行为模式和基本的文化价值取向。“七贤”并非都贤。其中有卖身投靠的（如山涛），有强作名士的（如向秀），而阮籍的幽默滑稽，嵇康的刚直狂放，刘伶的酒神精神，最代表魏晋时的名士风度。这种风度，不仅在当时风骚一代，而且对后世文人高士的精神，气质发生过深远影响。

晋朝有安贫乐道，“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五柳先生”——陶渊明（潜），他的为人，远官职如避瘟疫，憎显贵如恶虱蚤。他的诗，他的文，雅如其人，恬淡自然，辟伪崇真，字里行间浸透着田园的馨香，充满了大自然的静谧、和谐与安祥，同充满矛盾、欺诈、伪善的人间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陶渊明在生前和死后的一段时间里，诗名寂然。几十年后，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唐宋时，陶诗成为“田园诗”的风范，陶渊明也成为后世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隐士的典范。

盛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与此相应，中国文化继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第一次高峰期后再次呈现繁荣：儒、释、道三家文化争奇斗艳，相映成趣；宗教、艺术、文学、哲学也相互影响，各得发展，一时形成蔚为宏观的盛唐文化景观。在盛唐文化蔚秀园地中有一株招蜂引蝶的奇葩是李白的诗；对后世文人文化心理、审美意趣影响最深最远的是谪仙的情。

李白号称“诗仙”。盛唐文化的乳汁滋润了他的灵根，开元、天

① 《世说新语·任诞》云：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琊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七贤者，七怪也。

② 《释私论》。

③ 《与山巨源绝交书》。

宝之际潜滋暗长的社会危机铸就了他的悲魂。李白执剑浪游的侠骨、飘然欲去的仙气，狂饮高歌的激情，歌风咏月的野趣，以及他那“斗酒百篇”的诗才和笑傲王侯的人品均不是一般人所敢学、所能学的。他的诗，他的文，他的人，上承庄、陶，下启苏（轼）辛（弃疾），把中国文化的悲剧性推向了峰巅！因此，在中国不了解李白，就象英国人不理解莎翁一样，是可悲的。

赵宋王朝，国力衰弱，中国封建社会也由此开始了由盛而衰的“滑坡”。这一时期，为弥合后期封建社会的社会矛盾与文化危机，儒、释、道三教合流，道学顺势而生并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与正统。“道学”又叫“性理之学”，由宋初周（敦颐）、邵（雍）、张（载）开其源，由程（颢、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演其流。他们内部虽有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门户之争，但是在以“内圣外王”为宗旨、以“省察克治”为功夫以及“存天理，灭人欲”等基本立场上是一致的。人的情感世界再次被压抑在沉重的道德理性大山之下。

但是，人类的真情与人类生命一样永恒，即使是地狱的狂焰也无法把它烧尽！

宋词诞生了，它是在“理学”（礼教）严霜下挣扎的野草。在这片野草丛中，点缀着五颜六色的花——情人的伤别，游子的思念，少女的闺怨，征夫的乡愁，仙的幻想，月的皎洁，酒的奔放，梦的香甜，无不散发着人类真情中那略带野性的幽香，无不是对“礼”（理）的斯文“正经”的挑战！苏东坡的词正是宋词这片野草地里一簇遒劲、俏丽的梅：它豪放则“大江东去”，开豪放派之先河；婉约则“残月枯桐”，胜似柳永、李清照的细腻。加上东坡均可成为名家的书法、绘画和琴艺，使他成为有宋一代的旷世奇才。

明代“心学”盛极一时。随着明代中叶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儒学开始从内部腐烂。16世纪，由一代狂儒泰州学派所开创的“圣人大还俗”运动（“满街都是圣人”）加速了

儒学的瓦解。“赤脚圣人”王艮、颜山农、“妖人”何心隐、“异端之尤”李贽是泰州学派的杰出代表。“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①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93 年意大利文版序言中说：“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李贽正是中国 16 世纪的但丁！在他的思想中，“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褻渎了。”^② 李贽不愧为晚明的志士，面对森严的封建壁垒，他用骨头碰钝了锋刃，用血液浇灭了烟焰，在沉沉寒夜中追求着薄明的天色。他关于自私自利的人性说，男女平等、个性解放的“童心说”、“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怀疑精神以及揭露道学的千古绝唱，使他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从封建旧垒中冲杀出来的第一人！

1644 年“甲申”之变，清兵入关，“天崩地解”，明王朝被一个更具有野蛮性的游牧民族建立的专制政权取而代之。康、雍、乾三朝思想钳制，文狱大兴，明清之际曾一度活跃的民族主义及早期自由主义启蒙思潮大受摧残，思想界再度形成僵固凝滞、禁若寒蝉的黑暗之局。然而，哪里有高压，哪里就有反叛；哪里有禁锢，那里就有“异端”。文化史上的奇才怪杰再呈高峰，其杰出代表是活动在江南文化名城扬州一带的八位多才多艺的画家，史称“扬州八怪”。他们是“砚池滚滚惊飞涛”的“衣白山人”李鱣，“野性难驯”的“冬心先生”金农，先师工笔后以怀素狂草入画的“瘦瓢山人”黄慎，“云衣道人”罗聘以及才情志趣大体相同的汪士慎、高翔、李方膺，而“难得糊涂”的郑板桥，则是“八怪”中的奇中之奇，怪中之怪：

①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 32。

②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宣言》第 1 卷，第 254 页。

他援诗入画、诗画一体的高超的诗才画艺，把唐宋以后的文人画推向了新的高峰，他的人格也正象他所酷爱入画的瘦竹顽石一样，高风亮节，刚强顽硬，堪称有清一代的廉正气节之士。他那与众不同的才、情、志、趣、命，一读便知。

道咸之后，及至晚清，列强环伺，国难迭兴。西方文化籍近代工业和军事恣肆中国，致使一向对域外文化很少强烈关怀的中国人开始正视一个发达的域外文化的存在。学习西方，重估传统，再造文明，改进社会，成为近现代文化史上魏源、严复、孙中山、陈独秀、胡适直到毛泽东等几代先进中国人基本的文化立场和运思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步步“西化”和日趋急烈的反传统主义在近现代文化史上取代了原有的“传统”而成为一种新的传统，并逐步成为主流和“正统”。与“新潮流”相对应，“国粹派”和现代新儒学——近现代文化史上的两股“异端”产生了。清末民初的狂生怪杰辜鸿铭是“国粹派”的代表，他学贯中西、文理皆精，但直到“五四”时期仍发辩长垂，鼓吹忠君论和“尊王”之道，堪为一个畸型的文化标本。一代直声梁漱溟与国中奇人熊十力则是现代新儒学的殿军。他们反对“全盘西化”、力倡融会中西的文化立场，不仅与辜鸿铭不可同日而语，与新文化运动的方向也有偏离。复古乎？进步乎？人们似众说纷纭，但勿庸置疑，研究他们的才情志趣及其悲剧命运，与研究新文化运动一样，会有深刻的启迪。

冰冷的“厚黑教主”李宗吾，多情的浪漫诗人徐志摩，他们的人生同样具有文化价值：前者以“厚黑学”昭示国人，撕下了几千年来披在上层社会身上那美丽的画皮，称得上是对上千年官僚政治的大暴光；后者则用“浓得化不开”的情来滋润和昭苏国人“久蜇的灵性”。他大胆而泼辣地告别了传统的伦理与婚姻，在一声轰鸣中消失在开山峰峦间的云雾里。他“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却留下一串串隽永动人的诗……

(二)

奇才怪杰，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他们性格多样，气质也有差异。但是他们的人生曲线——才、情、志、趣、命，却有大体相同的轮廓：野性的美和悲剧性的命运。

才 不可否认，人的才能是社会教育、实践磨炼、环境薰染、文化积淀以及个人天赋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但是奇才怪杰的“才”往往有与众不同的异彩。其一，在成才的诸因素中他们的“天分”（自然禀赋）占有较重的影响。读庄子的文、李白的诗、东坡的词，看嵇康的传、李贽的史、志摩的事，常给人一种直觉：他们生来就是他们各自的“我”。同处战国时代，庄子生来就是一个庄子，他的傲慢与洒脱，是墨子、荀子、韩非打死也学不会、学不成的。同是盛唐诗人，李白生来就是一个李白，他的傲骨、飘逸、狂饮，是温厚笃实的杜甫不想模仿也模仿不成的。记得冯友兰先生论及李杜诗的才性差异时说过：李白是“诗仙”，杜甫是“诗圣”。圣人有规范，可学而至；诗仙才自天成，一诗一词从胸中自然流出，毫无规范，别人只有惊叹其美，无法学成。文豪苏东坡咏西湖诗云：“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水光山色，是天工所造的美，无需加以人工改造，西子是天生丽质，她的美无需艳装浓抹，别人也无法模仿，“东施效颦”只显其陋。“厚黑教主”李宗吾对此也有高论，他信胎教，认为“胎气”所染给人以无法改变的恒定影响，成为一生才命的重要因素。我们反对“天才论”，但不应否认人的自然禀赋对人生的重要影响。研究奇才怪杰尤其不要轻视这一点。

其二，奇才怪杰与众不同处，又在于他们有才而矜其才。在对才进行自我评价时，众人美谦屈，怪杰务发舒，有强烈的自信心与表现欲。“天生我才必有用”，李白的狂言可以涵盖古今一切奇才怪

杰的自我评价模式。德国奇哲尼采曾对西方文化史上千年之久的古典理性主义提出挑战，他在自传中正颜厉色地说：“我为什么这样聪明！”李白、尼采的话说明一点：东方也好，西方也好，大凡有稀世奇才的人，即使口不吐狂言，心底也掩藏着一股狂傲之气，它象火山底下躁动的岩浆，随时可能喷吐而出。才大气粗，怀才者多喜傲世。表现为强烈的个性。如王充“游必择友，不好苟交”，李贽性孤直，“喜面折人过”，一代直声梁漱溟明知与伟人毛泽东顶撞，小则挨批，大则惹祸，还是廷申面折，不屈己从人。民初狂人辜鸿铭精西学，长英诗，罕有其匹，理应成为“五四”新潮斗士，然而为不失个性随人言语，硬是“发辫长垂”顽冥不化。……因此，千百年来，奇才怪杰常肩一“狂”字。

其三，悲才。为才而悲，孤芳自赏是奇才怪杰才品的又一特点。庄子最早看到人因才致祸、“直木先伐”的人间悲剧，发誓要处于“材与不材之间”，这种自我保全的道术蕴含着他对古代摧残人才的社会现实的悲愤；王充出自细族孤门，才华难得施展，孤愤作才命之辩。他说：“贤不贤，才也；遇不遇，时也。……或高才洁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浊操，遇在众上。”（《论衡·逢遇》）把怀才不遇归之于“时”（命）流露了下层寒士的辛酸。苏东坡才品可谓双全，然而仕途坎坷，数遭贬谪，先后由京官贬到黄州、惠州、儋州，他自嘲说：“一双学士眼，半个配军头。”李贽性爱读书，尤喜鉴史，才识堪称一流，最终落得个书焚人死的结局。他的一首诗流露了怀才不遇的悲凉心境：“孤雁虽无依，群飞尚有伴，可怜何处翁，兀坐生忧患”。（《焚书·夜半闻雁》）“扬州八怪”之首郑板桥“难得糊涂”的妙语，道出了这位艺术大师不容于官场、世俗的苦闷。为才而悲是造成名流才士思想逆反、言行怪戾的重要原因之一。

情 人是理性加情感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人皆有一片情的世界。情，在奇才怪杰的胸腔里，又别有一种风韵：其一，以外寒内热为情的形式。奇才怪杰，因怀才不遇而孤芳自赏，因孤芳

自赏而常喜欢冷眼观世，直面人生。然而如果有人认为他们是缺少情感的冷血动物，或是缺少友爱、不懂世故人情的人，那便大错特错。孰不知，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压抑着对人道、对国族、对家庭、对友人至真至诚的爱，这种至情象久藏地底的炽热的岩浆，一有出口，便会喷射而出，造成情感世界的大地震。然而，由于他们爱得赤诚，爱得炙手，爱的狂热，这种“浓得化不开”的情常使缺少真情的官场中人、名场中人、利场中人不敢接受，久之，他们便陷入了“多情却被无情恼”的困境，从而形成外寒内热、形式上超脱，内心里矛盾的情感特征。

其二，以怀思古人作为寄托情感的方式。唐初才子陈子昂曾面对着茫茫之宇，悠悠之宙，在《登幽州台歌》中作出这样的悲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宇宙之永恒更映照出人生的短暂与渺小。怀古、咏古，是不得志于环境的人自我解脱、自我理解的寄情方式之一：面对有时空不在流动的“死”，活人感到“生”的壮烈与庄严；面对人人无法逃脱的“死”，穷通不一的活人感到了最终的平等。同时，在思古的幽情中，使人产生一种“我思古人，来人思我”的希望。这正是古今奇才多有怀古之癖的原因：面对着堆堆荒冷的坟墓，或古人曾经游乐其间的古迹，他们或歌或舞，或狂笑或痛哭，都出于一种自我理解、自我实现的悲剧心理的需要。对这种悲剧心理，李贽在他“自歌自哭”的《读书乐》中揭示的最为明白：“四时读书，不知其余。读书伊何，会我者多。一与心会，自笑自歌；歌吟不已，继以呼呵，动哭呼呵，涕泗滂沱。歌非无因，书有人；我观其人，实获其心。哭非无因，空谈无人；未见其人，实劳我心。”

其三，以愤世疾俗为情感发泄的途径。奇才怪杰，多是充满激情的人。谈起激情，人们自然会想起 19 世纪英国艺术大师特纳（1775—1851）他对海洋的观察和酷爱令人吃惊。67 岁那年，他要求水手们把自己系在桅杆上，使他能看清暴风雪和猛烈冲击小船的恶

浪。四个小时冒险观察的结果，便是完成于1842年的名画《暴风雪》：主题描写的是海洋与天空的疯狂搏斗。

中国文化史上的“异端”们，多是些敢将自己系在人生桅杆上的充满激情的人。当这种激情受到摧残、压抑时，为了不使激情把自己的心肝撕裂，狂傲不群、愤世嫉俗便成为他们发泄情感的唯一途径。

志 “异端”之士的志同样也有与众不同处。志者，理想也。在他们初涉世事时，多抱有积极入世、“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由于才、情与世俗多有不合，这种理想自然难以实现，于是转而产生遁世脱俗之志。然而，出世并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精神自由，成为独往独来，自贵其心，歌哭出处，一任天情的绝对自由者。如何获得这种自由？怪杰之祖庄子早就做出了精心设计。这就是“至人无己，神人无名，圣人无功”。无己就是超越生死的对立，无名、无功就是摆脱世俗名缰利索的束缚，一旦如此，便成了真正自由人：“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冻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庄子·齐物论》）庄子轻辞相位，陶渊明挂冠归田，李白醉卧月下，苏轼荡舟怀古……直到徐志摩任性的爱，均是这种追求自由的“志”的写照。“自由”，即使是为了个人心灵的自由，在君权社会中也往往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为了保持一点人格的独立、精神的自由，悲剧人生的主人公们不得不失去尊荣、地位、名禄、家庭、友谊，直到宝贵的生命。这是他们个人的悲剧，也是一种古老文化的悲剧。

趣 奇才怪杰对自然、人生多有极高的妙赏能力。他们的心自然的似二月里的风，纯洁的象山涧小溪的流，当他们用这颗童心去欣赏自然、反省人生时，往往表现出极富审美价值的“风流”（浪漫精神），这便是他们的异人的趣。这种趣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其一，幽默。大作家林语堂对“幽默”作过绝妙的界定。他说：“幽默

是一种心理状态。进而言之是一种观点，一种对人生的看法。一个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只要才能与理智横溢到足以痛斥自己的理想，幽默之花就会盛开……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人类一旦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无能与渺小、愚蠢与矛盾，就会有幽默者产生。”^① 奇才怪杰多是幽默大师：庄子对人生的漫画，竹林七贤的任诞，扬州八怪的滑稽，李厚黑的正话反说，辜鸿铭的言行乖戾……中国文化史上缺少了这些人，会象波斯没有奥玛·开阳，希腊没有阿里斯托芬，人们的精神会贫乏许多。

其二，酒趣。中国的奇才名士酒量有大有小，饮酒的方式有狂有温，但他们都与酒有着不解之缘，都有饮酒的雅兴。名士饮酒与众不同，他们饮酒并不计较饮量之大小，乃是着眼于醉中之趣，尤其追求醉趣中之仙气。能牛饮者未必有趣，可能不免于傖父之讥。所谓“醉趣”是指借酒力之兴奋与麻醉的力量而触发灵感，然后无拘碍地发挥其天性与天才。这是平素不易看到的奇迹，所以称之为“饮仙”。至若烂醉如泥，形如死猪，或使酒骂座，呕吐狼籍，则是酒后丑态，纵然海量，亦属无趣。“酒到微醉后，花将半开时”，此时最有韵味，奇才名士饮酒之后，在似醉非醉中使才情得到最佳的发挥，遂形成中国酒文化的特殊的美。

其三，野趣。这里所说的“野”不是粗野之野，而是指浪游天下与自然交友游乐的趣。奇才怪杰既然无法在庙堂之上实现自己的志向，自然会产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交八方友的浪游之趣。这样做，一则可以解闷，二则可以扩大自己的胸襟。宋代苏辙说得好，奇士应“求天下奇闻壮观，而后知天下之广大。过秦汉之故都，恣观终南、嵩、华之高，北观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人豪杰。……而后知天下之巨丽”。（《上枢密韩太尉书》）风流才士既然难见容于

① 《吾土吾民》（又名《中国人》）第 49—50 页。

正统文化，只好移情于“野”（自然），与风、花、雪、月为友。陶渊明爱菊成癖，苏东坡、郑板桥画竹称绝，李白邀月相饮，林逋“梅妻鹤子”，名士高人与兰为邻的亦非少见。他们咏月的清光寒影，是因为厌恶现实的黑暗污浊，他们爱梅、兰、竹、菊，是因“四君子”天香脱俗：梅，剪雪裁冰，一身傲骨；兰，空谷幽香，孤芳自赏；竹，高风亮节，萧洒一生；菊，凌霜自得，不趋炎热。

命 命是人生的际遇与结局。孟子说：“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孟子·万章》）。庄子云：“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庄子·人间世》）儒道对“命”的态度不同，但对命的理解是一样的，都是指一种人生无法预知、无力改变的结局。奇才怪杰的人生结局，带有大体相同的悲剧性：负志而往，不遇而悲。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性能移命。奇才怪杰的悲剧命运与他们的才、情、志、趣不无关系。既然自己的才情志趣为社会所不容，又不想改变自己的志，屈枉自己的情，也无力改造现实的“境”，结果只能落得个“负志而往，不遇而悲”的大惨局：他们携带着一颗滴血的心灵，野马漂蓬般地沦落在那虚无飘渺的理想世界中。而在无可奈何的现实中，他们只有两种选择：或者狂傲到底，为酷吏所虐杀，或者在“醉”中“梦”中寻找自己……

（三）

在纵向追溯了“异端”源流，横向分析了“异端”的情感世界及其悲剧命运之后，还有几句结论性的话，需向读者说明。这就是造成“异端”人物的原因，“异端”在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以及我们今天对这样的人应持何种态度。

人是个体的存在，又是社会的存在。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在考察异端人物个人悲剧的时候，首先应把它放

在一定的文化历史环境中去思考,放在个人与历史的矛盾中去把握。用这一方法去研究,我们不难看出下列几种因素的相互作用,是造成异端人物及个人命运的原因:

首先,历史动荡或社会大变革中的文化冲突,是造成异端人物的原因之一。在历史大变革中,必然出现文化整合机制的失衡和单一价值体系的分化。在文化变迁中,大多数人只有在文化冲突的高峰到来时或过去后的一段时间内才能完成价值观念的更新,而只有少数对社会矛盾有敏感洞察力的人,往往成为“先觉者”。他们理解时代,但并不为时代和俗流所理解,从而显出“奇”和“怪”来。

其次,现实黑暗及其相随而生的文化专制主义是造成“异端”人物的又一原因。魏晋之际,政治黑暗,门阀腐败,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由此激起玄风,形成魏晋名士“立言籍于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的(裴頠《崇有论》)狂放任诞之风。社会黑暗必有高压政治和文化专制主义与之伴生,晚明的特务政治及明清的“文字狱”恰是晚明何心隐、李贽、东林名士等“妖人”以及清代以郑板桥为首的扬州八怪“离经叛道”的真正原因。从这一意义上说,“异端”又是高压政治和文化专制主义造成的社会逆反心理的表现。

再次,与现实得失成败相连带的利害关系的因素对于形成奇才怪杰的个性特质来说也不可排除。人生活在现实中,利害关系对人的言行、个性具有重大制约作用。一般来说,既得利益者往往心平气和,言行温文尔雅;而失败者则大多容易偏激愤世,言行怪戾。以奇才怪杰名世的“异端”之士大都是一些在仕进之途被君所弃或怀才不遇的失败者。

最后,如果我们不排除偶然原因,那末,个人秉性中的先天性自然禀赋,对人的行为特点也有影响,甚至是不可轻视的影响。本书中的怪杰诸公均已作古,我们已无法测定他们的血型 and 气质,但我揣测,他们大多是多血质气质类型的人。这种人生来活泼机敏,精